

Daily Lif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A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城乡日常生活： 一种社会学分析

○ 主 编/杨善华

○ 副主编/程为敏 刘小京 罗沛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主 编/杨善华

◎ 副主编/程为敏 刘小京 罗沛霖

城乡日常生活： 一种社会学分析

Daily Lif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A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杨善华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8

ISBN 978 - 7 - 5097 - 0272 - 7

I. 城... II. 杨... III. ①城市 - 社会生活 - 研究 - 中国
②乡村 - 社会生活 - 研究 - 中国 IV. 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9172 号

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

主 编 / 杨善华

副 主 编 / 程为敏 刘小京 罗沛霖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教材事业部 (010) 65281150

电子信箱 / jiaocai@ssap.cn

项目经理 / 杨桂凤

责任编辑 / 谢蕊芬

责任校对 / 盛 起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8 字数 / 302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272 - 7/D · 0111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杨善华

这本书辑录的大约是 2000 年以来我们田野调查的成果，其中多是学生（有不少是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有的已经公开发表在像《中国社会科学》或《社会学研究》这样的专业杂志上。然而其中的大多数论文虽然我认为已经达到了可以发表的水平（当然有的还不免有稚嫩之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获得发表的机会，很是可惜。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世，既可以让学界同仁了解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中研究的进展，也可以让学生获得一个接受批评和提高的机会，而对于教师来说，这更是一份眼见“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欣喜。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想法。

正因为是学生的论文，所以就必然和我们在教学中的探索相联系。自 20 世纪末以来，我们一直关注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的教学目标应该定在哪里这样一个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看法，那就是：这些学生经过四年的本科学习是有可能具备独立工作能力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考虑学生这方面的因素）取决于我们是否有明确的目标并在教学的各个环节能否贯彻这样的目标。结合社会学专业的情况，我认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到毕业的时候至少应该让他们具

* 本书的出版得到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资助，编者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备三个方面的能力：第一是读书的能力，这是指阅读学术大家（包括社会学思想大师）学术专著的能力，首先是按作者的意图理解原文的能力，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对大师思想的领悟的能力，再次是将这样的领悟融会贯通，整合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的能力。第二是在考察社会现象时提炼与概括的能力，并通过这样的提炼概括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洞察。第三是学术评价和鉴赏的能力，这是指能准确判断并品评一件学术作品的价值与缺陷。对学生来说，这些能力的培养意味着他们在学术领域的努力可以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也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学术实践的把握有了相对准确的标准，这将使他们的努力不再盲目。

虽然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全体授课教师的共同努力，但这也绝非意味着个人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学生能力的获得必须依靠他们个人积极主动地投入教学活动和研究实践，依靠他们在这样的实践中思考和领悟，所以，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研究兴趣方面，教师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出于这样的想法，这几年，我们在本科生的教学和研究实践方面有很大的投入。比如说，借助对访谈资料的课堂讨论和实地调查这样的实践来激发学生对社会学的兴趣，训练他们对事实（文本材料）的敏感性，同时学习如何在社会学的视野中理解（洞察）材料和事实的意义并进一步做出理论的概括。这本论文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证明了这样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方面，研究构成了一个重要环节。如何从身边的社会现象入手去达致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进而做出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概括，这一直是我们在研究中试图解决的问题。因为从训练学生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更容易操作，也更容易让学生接受，从而激发起他们的兴趣。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研究和教学就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在获取资料的同时，我们也在探究现象背后的意义：首先是理解，其次是解释（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是理解几乎不可分的解释）。很自然地，我们将目光投向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和舒茨在韦伯的从理解社会行动的意义出发的解释社会学和胡

塞尔的现象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探讨人际互动所立足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现象学社会学。

从我们的实践看，现象学社会学虽有它的局限，但它将日常生活作为“生活世界”的主要部分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试图探究生活现象背后的社会学意涵并在理解这种意涵（比如人的行动的意义、各种文本背后的意义）的基础上力求对此给出一个“真”的解释。因此，在现象学社会学的背后有着广阔的哲学背景，这使现象学社会学有可能获得一种独特的对生活的穿透力，可以揭示各种生活现象背后灵动不拘的意涵，并将这样的意涵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相联系，从而获得对生活现象的一种深刻的、带规律性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体验到生活本身的那种生动和丰富，体会到生活的真实。这样的做法用一句现象学的行话来说，是“朝向事实本身”，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为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生活。因为在这样的想法指导下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们的困惑^①，因此，这一思想后来成为我们研究方法论的主要框架。为了让读者能更多地了解这样的方法论，本书收录了《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一文，供大家参阅。

在这样的前提下，“理解”和“解释”就成为我们研究必须达致的目标。从前述方法论思想出发，我们在《农村村干部直选研究引发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中曾提到，看待农村问题可以有三个视角：政府官员的视角、学者的视角和农民的视角。“显然，真正要了解农村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必须知道农民眼中的‘农村实际’，而不是用学者或官员眼中的‘农村实际’来代替农民眼中的‘农村实际’。”（杨善华、罗沛霖、刘小京、程为敏，2003）因此，必须对农民的行动做到“投入理解”和“同感解释”^②。这才

① 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生活本身的生动、丰富和真实与对现象的有解释力的理论概括，这两个方面有效体现在研究中。

② 即将自己置身于农民身处的社会环境以“换位思考”的方式来理解农民，同时按农民自己赋予他们行动的意义来解释农民的行动和农民的态度。

是“思想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的本意。很明显，这样一种方法论思想可以推广到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研究对象。在本书收录的论文中，我们也尽量努力做到这一点。

由本书的题目可知，本书是以社会学的视角来透视城乡的日常生活，即对日常生活进行探究和反思。之所以称为“探究”和“反思”，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探究是指对新发现的社会现象的意义所做的探索，而反思则是对早已被发现但被公众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现象的意义所做的再思考。显然，反思的目的在于揭示我们生活中的“盲点”和误区。

同样，从这样的方法论思想出发，我们必然会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也势必会坚持以“日常生活”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① 在《近期中国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中，我们曾从家族活动的视角对农民的日常时间做了这样的区分：农民的日常时间^②还可分成日常生活时间和“事件”时间。日常生活时间通常是指家族成员为了生存和满足自己生理需要所耗费的时间，它的特点是具有重复性与稳定性，如做饭、吃饭、生产、交往、休息等；“事件”时间是指当生活中出现各类对家族生存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时，家族成员在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它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在总量上则可长可短。将“事件”时间从日常生活时间中剥离出来是因为在事件中能真正凸显家族成员内部的关系与家族和外界的社会关系的真实情况，看到家族成员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家族意识如何指引着人们的行动。但是日常生活时间和“事件”时间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家族成员之所以能被动员起来是由于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具有家族意识，看到了自己的利益所在和在事件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这样一种

① 书中选了杨善华《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兼谈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

② 这里不提仪式时间是因为北方农村中有很多地区没有这类仪式时间。另外，即使有这类时间，仪式时间在一年的时间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对较小。

意识和对自己和他人关系的了解显然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可以这样认为，农民从自家的生存和发展出发，一直在日常生活中用“人情”和交往精心编织一张有事时能用得上的关系网。家族中的其他成员无疑是这张关系网的优先入选者。所以对日常生活中农民的活动和事件中农民的活动都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杨善华、刘小京，2000）

这虽然讲的是农村家族，但就对日常时间的划分来说，于城市中的居民也有普遍性。这可以启发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城市各阶层市民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而不再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只是看作为满足生理需要的重复行动。可以说，这样的视角既为我们（包括学生）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也对我们（包括学生）洞察的敏锐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这也绝不是高不可攀的。比如高虹远同学的论文，我们在阅读时是能够察觉她在挑选论文材料时对事实所包含意义的那种敏锐的感受的。

但是，实现意义的探究确实还有很多技术层面的细节。从求“真”来说，通过调查获得“真实”和把握“真实”显然是我们的目标。就农村调查而言，它需要我们真正“进入”农村，和农民交朋友，拉近研究者与农民的距离，以求对农民的生活有真切的了解，对农民的态度和行动能“感同身受”。从我们的经验来看，这绝非一次调查就能完成。因此，每当我们获得一次村落调查的机会，我们都会尽量把它变成一个类似研究基地这样的调查点，然后不断追踪它发展的轨迹。调查时间最长的那个村庄，我们已经追踪了10年，村中不少村民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熟悉他们的个性，熟悉他们之间的关系，熟悉在他们身上和他们周边发生的故事，这使我们可以将他们的行动放在村庄的“文化权力网络”（杜赞奇，1994）的背景下来考察，自然也有助于我们对他们行动的意义了解和判断。书里收录的以农村调查为基础的论文基本上都是这样完成的。

当然，我们强调这样一种访谈方法，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并非意味着我们忽视理论。理论对于我们这样的研究的意义在于，在访谈或实践前告诉我们问题域的可能的指向，以及发现和提出一个有价值的理论问题；而在访谈中先前的理论准备则可以在我们感受被访者的话语与行动时增添我们的敏锐性，发现值得追溯的问题并从这些话语中挑选出有社会学价值的事实并寻求对其加以理论概括的可能性；在访谈结束后分析材料时，理论则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足够开阔的视野，将感性材料转化为理性认识。在《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下）》的编者自序中我们曾经这样写到，这些年的研究实践使我们越来越认同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这种“大历史观”在有的文章中被解释为用“长时间、宽视野、远距离”的宏观角度来重新检视历史这样一种研究设想（杨念群，2001）。我们深切感到，离开这样的设想，就无法认识和把握村落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和可以看到的种种现象。因为只有在“长时间、宽视野”中我们才能理解和认识这样的事件和现象所蕴含的普遍意义并在发生学的层面给出一个准确的解释。但是在田野调查中考察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时，为了达到精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近距离”的观察和描述也是必要的。因为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所谓“细微”的现象背后一样有着深刻、具体并与现象相连的类似“本质”的东西。这就是现象自身所浮现的意义（杨善华、程为敏，2005）。正是出自这样的想法，我们希望在自己的研究中能做出历史感和层次感，并也试图用这样的想法去影响学生。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自可以去辨别。

最后还想说的是，研究团队所形成的学术氛围在学生学术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学生在感受和选择事实的时候是需要一种评价能力的，这种评价能力既源自学生对社会现象的洞察，也是学生学术评价能力的表现。但是不管是哪种能力，它的获得都需要靠学生自己的投入，靠他们在实践中的体会和领悟，最终内化而与主体合一。在这个意义上，调查后的小组讨论可以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学生可以将自己的发言与其他同学的发言相比较，迅速发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并找到今后努力的方向。而训练有素的学生则可以通过自己的发言起到给新手示范的作用，这样就在事实上形成一个群学群比的“场”，使每个参与讨论的人感受到一种群体的压力，激发他们迎头赶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在这样的讨论中探索一条学生能力培养的具体途径，由此，这些论文也可以看成是学生能力提升的一种标志。

当然，在这样的群体中，老师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教师的责任是通过中肯的评点，激发大家的研究兴趣并通过肯定学生发言中某部分内容的价值和指出发言中的缺陷来指明学生今后努力的方向。在这些学生成长的过程中，程为敏、刘小京和罗沛霖都付出了很多心血，所以他们参与本书的主编也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学生的研究兴趣一旦被激发，他们也会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形成自己原创性的思维，反过来也会启发教师对某一现象做深入思考；而他们学术评价能力的提升则会使教师不得不更慎重地考虑自己的评点，从而对教师的学术评价能力构成挑战。其最终的结果是产生出一种集体的智慧从而提升团队的研究层次。在这样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意蕴和探索的乐趣，而这些论文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集体探索的成果。

在以往的实践中我们深切认识到，学术是没有止境的。因为对人类创造的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以及对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探索都不会有尽头（而且知识还在不断产生，生活世界也并没有停滞不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命不息，探索不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未来的学术道路仍然会充满各种艰难和坎坷，但屈原的这两句诗将鼓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001
-----------	-----

方 法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杨善华 孙飞宇 / 001
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 ——兼谈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杨善华 / 021
南镇印象	杨 可 / 026

流 动 民 工

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	杨善华 朱伟志 / 032
非正式规则：珠江三角洲新一代流动民工的 行为策略	彭钢旋 / 047
关于中国南部农民工的社会生活与手机的 研究	罗沛霖 彭钢旋 / 083

城乡社会生活

天主教徒：边缘化地生活在村庄世界中	梁玉梅 / 102
-------------------------	-----------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否保障农民的健康? 钟剑华 / 128
- 私营企业主的自我定位和子承父业的无奈选择
——就浙江某市个案对向上社会流动的探索 高虹远 / 139
- 一以贯之的家庭责任与退休生活的平稳过渡
——以北京市宣武区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为例 齐 欣 / 163
- 离家与回家
——中国当代城市家庭中的“现代”与“传统”
两种观念的冲突与融合 陆毅茜 / 185

村庄政治

- 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
——以苏南某村为案例 宋 婧 杨善华 / 204
- 村落社会的解体和能人治理的幻灭
——以山西省 D 县 Z 村的村干部直接选举为例 曹理达 / 233
- 村庄关系网络的重构与选举胜出的机制分析
——以山西省 D 县 Z 村的民主选举为例 陈 超 / 249

妇女与儿童

- 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
——以宁夏 Y 市郊区巴村为例 杨善华 柳 莉 / 270
- 走出私人领域
——从农村妇女在家庭工厂中的作用看妇女地位 许敏敏 / 284
- 社区情境与城乡智障儿童教育模式的差异
——对北京市智障儿童案例的分析 刘丽敏 / 306
- 从“走入公共领域”看女性的自主意识
——北京胡同老年妇女生活史研究 侯梦蕊 / 320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杨善华 孙飞宇^{**}

一 问题的提出：“深度访谈”的实质

“深度访谈”作为定性研究中的方法，在目前的社会学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所谓深度访谈，学界所指的主要就是半结构式的访谈（Semi-structured Depth Interview）（Hakim, 1987; Arksey & Knight, 1999; Wengraf, 2001）。文格拉夫（Wengraf）提出了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它的问题是事先部分准备的（半结构的），要通过访谈员进行大量改进，但只是改进

* 此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是我们课题组多年实践的结晶。在此，首先要感谢课题组的刘小京、程为敏和罗沛霖教授以及彭钢旆、宋婧等同学，文中不少观点来自我们之间的讨论和参加调查的同学的发言，他们对此文贡献良多。

** 孙飞宇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8级本科生、2002级硕士生。

其中的大部分：作为整体的访谈是你和你的被访者的共同产物（Joint Production）”；它的第二个特征是“要深入事实内部”（Wengraf, 2001: 3）。

关于第一个特征，文格拉夫指出，访谈员事先所准备的访谈问题必须要具有开放性。在访谈中，被访者对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的回答和随之而来的问题都是研究者预先无法计划的，因而，访谈必须“以一种谨慎的和理论化的方式来加以改进”（Wengraf, 2001: 5）。这一特征已经成为关于深度访谈的基本共识，也是我们对访谈的基本主张之一。在具体的访谈过程中，研究者不能试图去确定和提出每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具体问题，甚至也不能够事先确定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在事先的准备过程中，“半结构式的访谈应当只确定主要的问题和框架，访谈员应能够改进随之而来的问题，并同时探究意义以及出现的兴趣领域。在事先确定主题和话题领域的情况下，要渴望听取被访者的叙述。但访谈员也要注意改进问题，以澄清或者扩展回答”（Arksey & Knight, 1999: 7）。在这样的前提下，“尽管访谈员足以将谈话导引到感兴趣的题目上，深度访谈还是会为被访者提供足够的自由，他自己也可以来把握访谈”（Hakim, 1987: 27）。

但是深度访谈最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它的第二个特征，即“深入事实内部”。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何谓“深度”。另一个是如何能够深入事实内部？关于“深度”，文格拉夫提出了两个方面：①“深度”了解某事乃是要获得关于它的更多的细节知识；②“深度”指的是了解表面上简单直接的事情在实际上是如何更为复杂的，以及“表面事实”（Surface Appearances）是如何极易误导人们对“深度事实”的认识的（Wengraf, 2001: 6）。

文格拉夫强调了更为丰富的细节知识和事实之间的意义关联，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对深度访谈之“深度”的全面解析。如果考虑到格尔茨所强调的“深描”（格尔茨，1999）就会发现，文格拉夫并没有关注访谈员在深度访谈中所遭遇到的舒茨所谓的两个世界的问题（Schutz, 1976）。换句话说，所谓“深度”的问题，是

与如何达到深度的问题密切相关的。而深度访谈的实质，并不是仅由对待“深度事实”的态度所构成。如果不对深度访谈的具体方法做详细的讨论和清晰的认识，就很难达到访谈的目的。

格尔茨主张在面对复杂而又含混的文化结构时，首先应该掌握它们，然后加以转译，这种掌握是以被访者的概念系统来完成的。换言之，研究者要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中去，“必须以他们用来界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语句来表达”（格尔茨，1999：18）；然后再将所得到的信息“转译”为社会研究的语言，对此信息的意义给出解释。所谓深度的事实，从意义的角度来说，首先是要了解它对于被访者而言的意义，然后才能够考虑研究者的意义情境。

对深度访谈的态度直接由对待定性研究的态度决定。在访谈当中面对叙述者的时候，我们想获得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意哈克姆的观点：“定性研究关注于个体对他自己的态度、动机和行为的表述（Accounts）。……定性研究的使用并不必然意味着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将所有的解释都归之于自我指向（Self-directing）的个体。但是人们关于情境的自我定义是任何社会过程的重要因素，即使它没有提供完整的表述或者解释。”（Hakim，1987：26）被访者在整个访谈过程中的所有表现都是研究者观察的对象，并且是后者研究资料的来源。就意义角度而言，这就又回到了韦伯在讨论社会行动时提出的观点：社会行动是被行动者赋予了意义的，而这样的意义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理解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是社会学的任务，而且这样的理解必然与解释联系在一起。^① 访谈资料

① 虽然后来舒茨对韦伯的说法有很多批评（详见 Schutz，1972），比如认为韦伯没有注意到文化客体制造者的意义与被制造客体的意义，意义在自我和他人那里的构成、修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自我理解与理解他人的重要性等，但是从我们的经验研究的实践看，韦伯对社会行动所蕴涵的意义做出的判断仍然可以成为我们讨论深度访谈的实质的出发点。



既然来自被访者的叙述，那么这样的资料一定也是由被访者赋予了意义的（或者根据我们深度访谈的实践可以这么说：这是经由被访者主观建构的叙述），因此，一般来说，对访谈资料的理解和解释可以大体等同于对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我们要理解并给出解释的则应是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话语）的意义。这其中包括被访者赋予这些资料的意义，以及这些资料和被访者的行为对研究者而言的意义。此外，我们还要关注访谈发生的场景，因为这样的场景同样是由被访者赋予了某种意义的，并且该意义与被访者赋予自己叙述的意义是存在着某种联系或一致性的。

我们达到研究目的的前提在于对这种访谈资料的理解和解释。由此，我们进一步认为，深度访谈发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被访者的社会行动的发生过程。所有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的表现，诸如动作、表情，以及最重要的叙述行动也需要我们去观察、理解与解释（即在深度访谈这一获取资料的过程中，必须将资料的载体也纳入资料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样的观察、理解与解释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要与被访者的意义体系相混淆，我们应该在行为者的日常系统中完成对行为者的“投入的理解”和“同感的解释”（杨善华、罗沛霖、刘小京、程为敏，2003）。这也符合韦伯的原意，也就是说，对于行动的理解要将其放置在行动者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进行，但同时也要注意明确区分研究者与被访者——我们所理解的是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而不是我们研究者主观认为并强加于行动者的意义。舒茨将各个有限的意义域称为各意义世界，进入社会科学的世界意味着：放弃自然态度，成为价值无涉的观察者（Disinterested Observer），同时具备与日常生活不同的意义关联体系。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社会科学与日常生活并非同一个世界，那观察如何成为可能？即使论域限定在访谈之中，问题也同样存在，研究者如何首先获得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的理解？舒茨认为：“当他（社会科学观察者）

决定科学地观察这个生活世界时，即意味着他不再把自身及自己的兴趣条件当作世界的中心，而是以另一个零点取而代之，以成为生活世界现象的取向。”（Schutz, 1962: 158）社会科学的观察者，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参与者，即使是在访谈类的观察中也不是如此，尽管访谈的特征是双方的互动。因为访谈一旦发生，被观察者的日常生活也就停止了。要完成一个从日常生活的至尊现实世界到社会科学世界的跃迁，就必须将自己从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并将自己的目的动机限制在如实地描述与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世界中去”（Schutz, 1976: 17）。所以，如果研究者以社会科学观察者的“单一”身份来进行访谈，就不能够从根本的意义上完成对被访者日常生活的了解。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与被访者共同建立一个“地方性文化”的日常对话情境。同时，研究者还必须能够分清楚，自身的世界——无论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世界还是自己作为常人的世界——不同于被访者的世界。研究者必须防止以自身对于世界和事件的意义性观点来取代被访者的观点。

因此，从意义的角度来看待“深度访谈”的实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是对被访者在访谈时赋予自己的话语的意义以及被访者赋予访谈场景（包括被访者当时的衣着、神情、行动和居家环境）的意义的探究。^①一旦研究者明确了这一点，便可以以一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和立场去实现这样的探究，而这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和立场的标志就是在访谈当时和现场就开始这样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度访谈既是搜集资料的过程，也是研究

① 意义的探究是现象学和诠释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我们在这里回避了意义的探究为何是可能的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它的解答涉及人的认识何以是可能的这一哲学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此为本文之力所不逮，因而本文只将如何在深度访谈过程中进行意义的探究作为主题。于此，我们还要申明的是，虽然我们强调在访谈开始时研究即告开始，但是这并不排斥在访谈结束后我们对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探究，对于研究而言，这同样是必要的。